



## 评新编两种苏曼殊诗集

林 辰

南社著名诗人苏曼殊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从一九二〇年王德钟编纂《燕子龕遗诗》开始，曼殊的诗文小说，不断被人辑为各种专集、合集出版；至一九二八年，柳亚子编辑的《苏曼殊全集》由北新书局出版，煌煌五大册，集曼殊著译的大成，更引起读者的注意，流传甚广。一九三三年柳亚子又编辑普及版《苏曼殊全集》，内容较北新版更为充实，由开华书局出版。这种情况，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致日本增田涉的信中，曾称之为“曼殊热”。其后，还有一九三六年文公直编的《曼殊大师全集》，抗日战争期间，柳无忌一九四三年在重庆编印的《曼殊大师纪念集》等。解放以后三十年中，没有印行过曼殊的任何作品；直到最近，我们才重新有了接触曼殊作品的机会，施蛰存辑录的《燕子龕诗》和刘斯奋编著的《苏曼殊诗笺注》，于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相继出版了。

曼殊的诗作，几乎全部都是抒情诗，词旨悱恻，婉丽清怨，音节又很和谐，易于记诵。论者多谓他的诗得力于龚定庵，有清新味和近代性。他写爱情题材的诗较多，被人评为“其哀在心，其艳在骨”，但有的情调低沉，也曾引起过不同的议论。他的诗散见于《南社丛刻》和上海及日本东京的报纸杂志上，很难搜集齐全。现存几种主要本子的内容是：王德钟辑《燕子龕遗诗》，共收六十五首；《沈尹默书曼殊上人诗稿》，共收七十四首；柳无忌辑《苏曼殊诗集》，共收八十四首；柳亚子编北新版《苏曼殊全集》，共收八十六首、开华版《全集》，共收九十六首，较前者增多十一首（北新版《题画》一首不计在内）。这个本子，在数量上超出以前各种版本，为编辑曼殊诗奠定了基础；后出各本可说都是以它为蓝本，纵有增减也不过在二、三首之间。现在新出的这两种诗集，大致也不出这个范围。

施蛰存同志是我们熟知的作家，现在他来辑录曼殊的诗，很引起我的兴趣；刘斯奋同志的那一册，则是曼殊诗的笺注本，我也很想读一读。现在，就把我读了这两本书后的一些零星意见写在下面。

### 施蛰存辑录《燕子龕诗》

本书是江西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百花洲文库》第一辑的一种，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

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曼殊诗，下卷收诸家投赠、唱和及哀悼之作。书前还采录了柳亚子作《曼殊新传》及王德钟作《燕子龕遗诗序》各一篇。

在这个集子的上卷中，共收曼殊诗四十八题，九十九首。据《引言》及书后的两篇跋文所说，辑者是从王德钟辑本、沈尹默手写石印本及中央书店本《苏曼殊诗文集》等抄录编辑而成。序跋中没有提到柳亚子先后编印的北新版和开华版两种《苏曼殊全集》中的诗集，但从所收诗看，较完备的开华版中的九十六首都已收入。另外还增加了《游不忍池示仲兄》、《久欲南归罗浮不果，因望不二山有感，聊书所怀，寄二兄广州，兼呈晦闻、哲夫、秋枚三公沪上》、《题蔡哲夫藏担当山水册》和《题画》四首。除《题画》外，其他三首都是过去各种版本的曼殊诗集所没有的。可惜辑者没有一一注明它们的来源。以我所见，前二首是从文芷的《曼殊上人诗册》一文录出的。文芷说他于一九六二年“偶然得到曼殊上人诗稿十叶”，从上面发现了这两首佚诗（见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出版《艺林丛录》第五编）。这两首诗的内容同曼殊生平的行迹、交游等大体相合，可信为曼殊的诗。《题蔡哲夫藏担当山水册》一首，不知所出。担当和尚原名唐泰，字大来，云南晋宁人。明亡后出家为僧，结茅鸡足山。他能诗善画，有少数作品传世。据玉谷在《担当山水册》一文中说，蔡哲夫收藏的这本画册，得于云南，一九四七年冬在南京被人窃去。他从一本名为《茶丘契阔集》的抄本中收得诸家题咏，有近人赵藩的题记一篇，周肇祥等十一人的题诗各一首，曼殊诗列在第四（见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艺林丛录》第二编）。曼殊对明末清初一些富有民族思想的高僧，具有同情和崇敬，在《燕子龕随笔》中称澹归和尚（金堡）的《貽吴梅村》一律“大义凛然”；《岭海幽光录》中又说读了僧祖心（函可）的诗，令人“种族之爱，油然而生”。所以他为担当的山水册题诗是很自然的，此诗应即由这本画册传出。至于《题画》一首，柳无忌辑《苏曼殊诗集》和柳亚子编北新版《全集》都曾收入，至开华版《全集》始删去，编者柳亚子曾有说明：“各家录曼殊诗，都有《题画》一绝，据邓以蛰先生说，此诗实明末僧人之作，今真迹尚保存无恙，故特删去。”按此诗系曼殊自题所作画，由邓实（秋枚）代书其上。邓实答柳无忌书说：“查此诗为曼殊自作，而嘱弟代题于画上。”（见《苏曼殊年谱及其他》附录）明确如此，应无可疑。此诗又见于曼殊的短篇小说《非梦记》，托为燕生海琴题画师汪玄度所作画，“画松下老僧，独坐弹琴，一鹤飞下”。故首二句云：“海天空阔九皋泳，飞下松阴听鼓琴。”曼殊曾自署“燕影”，从小说中燕生的举止性情，仿佛可见曼殊自己的面影。我认为邓以蛰的话很含糊，在没有查明明末僧人为谁，真迹保存何处之前，仍将此诗保留下来是适宜的。

在本书中，最值得研究的，是《本事诗十首》。这是曼殊最有名的一组诗，其中第九首“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尤为脍炙人口。这一组诗，最早的王德钟辑本《燕子龕遗诗》没有收入，自沈尹默写印本《曼殊上人诗稿》以次，才被收入各本诗集或合集。在各种版本中，这一组诗的内容完全相同；但在施蛰存同志的这个辑本里，却面目大变，无论在内容上、在编排上，都与历来的传本相差很大。以流传最广的柳亚子编的两种《全集》来说，这组诗的第三首为：

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

第四首为：

慵妆高阁鸣箏坐，羞为他人工笑颦。  
镇日欢场忙不了，万家歌舞一闲身。

在本书中，这两首被删去了，却把曼殊的《为调箏人绘像》二首之二“淡扫蛾眉朝画师”一首移来，列为第三；另外增加了我们前所未见的一首，列为第五：

愧向尊前说报恩，香残黛浅含颦。  
卿自无言依已会，湘兰天女是前身。

这是柳编两种《全集》及其他各本都没有的。另有几首的排列次序，也有变动，如原第八首“碧玉莫愁身世贱”，被移作第四首等等。变动如此其大，但施蛰存同志没有作一字说明。他在《跋二》中写了这样几句：“近日又有友人抄示海外所传曼殊本事诗十章，并陈仲甫和作，曼殊诗下自注暨仲甫诗，皆未尝有刊本。”那么，本书所收就是海外传来的这十首了。据现有资料看，他说的海外所传曼殊《本事诗》，就是从上文所举香港文芷的《曼殊上人诗册》一文传出的。文芷说，他得到的曼殊诗稿上有二十首唱和诗，“每一首诗的后面都注有一‘仲’字或‘嚳’字。曼殊有一个名字叫嚳嚳；‘仲’就是仲子，也就是陈仲甫独秀。”其中“丹顿拜伦”和“慵妆高阁”两首之后，都注一个“仲”字；“愧向尊前”一首之后，注了一个‘嚳’字。本书辑者（或抄寄给他的人）就是依据此文抄录，于是历来都无异辞的前两首就当作陈仲甫之作而被删除，又把各本俱无的后一首收入，改变了相传已久的这一组诗的面目。

对于这三首诗的问题，文芷认为是一个“疑团”，难于解释。我没有见过诗册原件，不能断定是否曼殊真迹，这问题有待于其他材料的发现，才有希望解决。但不管怎样，那注“仲”字的两首和注“嚳”字的一首，都确是曼殊的诗。这里，我想就这三首诗的作者和《本事诗》的组成，谈一下自己的意见。一、柳亚子在《对于〈曼殊研究草稿〉的我见》一文中说：“曼殊《本事诗》脱稿后即分寄友朋，我和高天梅、蔡哲夫都有和作，现在还留存在我的旧诗集中，这的确是一九〇九年上半年的事情。”如果“丹顿拜伦”、“慵妆高阁”二首确为他人之作，曼殊何至攘为己有并毫无惭怍地抄寄友朋呢？这一组诗最早载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三集，这一集由柳亚子主编（见柳著《南社纪略》29页），可见是柳亚子亲自将它编入这一集发表的。当时曼殊所寄和他的朋友们所见的《本事诗》十首，都包含有这两首在内，我们自应以此十首为准，保存原来的章目和编次。二、据诸家研究，这一组诗是为日本艺妓百助眉史而作；而《为调箏人绘像》二首的调箏人亦即百助，两题所咏同为一人。因此，当《本事诗》十首未最后写定时，容易将有关百助的“淡扫蛾眉”、“愧向尊前”两首也抄在一起；最后经过斟酌，才选取十首，编定次序，合成一组，题为《本事诗》，确定下来。文芷所藏《诗册》，可能是未写定前所录，故与后来各本所载定稿不符。三、“淡扫蛾眉”一首，应归入《为调箏人绘像》，为该诗的第二首。过去各本，莫不皆然。《绘像》与《本事诗》同时发表于《南社丛刻》第三集，岂有在两题中重复“淡

扫蛾眉”一首之理？可见曼殊当时已分别编定，《诗册》是不足为据的。至于“愧向尊前”一首，各本所无，但从内容和文字看，仍应为曼殊作品。诗中谈及“湘兰天女”，原注云：“曩在秣陵，仁山居士为余道马湘兰证果事甚详。”《燕子龕随笔》中亦有一则：“十一月十七日病卧祇垣精舍，仁山老檀越为余言秦淮马湘兰证果事甚详。近人但优作裙带中语，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据柳亚子《重订苏曼殊年表》，曼殊于一九〇八年九月至南京，主讲祇垣精舍，十二月离去。注云“曩在秣陵”，则此诗必作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以后，与《本事诗》之作于一九〇九年上半年者，时间上很接近。马湘兰为明末秦淮名妓，百助身份正与之相合。这也是曼殊为百助写的一首诗，《本事诗》定稿时没有收入，也未单独发表，因而刊落。我以为应作为集外诗予以保留。总之，我的意见是，即使文芷所藏《诗册》上存在着两首署名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结论，不能遽然改动曼殊本人的最后定稿，不能用一个孤证否定传世的各种版本。本书对《本事诗》十首的处理，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本书卷首，有柳亚子撰《曼殊新传》，《引言》中称“这是最详尽的一篇苏曼殊的传记”。不知这篇《新传》后来已被作者本人完全否定。查柳亚子约于一九二〇年写过一篇《苏玄瑛传》，说曼殊的父亲是广东香山苏某，母亲是日本人。一九二八年八月又写定一篇《苏玄瑛新传》，根据曼殊托名日本僧飞锡所作《〈潮音〉跋》，参以曼殊小说《断鸿零雁记》，说曼殊的父母都是日本人，父死后随母改嫁在日本经商的香山人苏某，纯然是日本血统。但到了一九三二年九月，柳亚子重新写了一篇《苏曼殊传略》，对《新传》作了重大的更正，结论是：曼殊的父亲叫苏杰生，广东中山县沥溪乡人，在日本横滨万隆茶行当买办，他和家中雇用的一个日本下女生生了曼殊，六岁时由杰生正室黄氏携之归国。这就完全否定了《新传》所提父母均为日本人的说法。对于《新传》的错误，柳亚子说是“上了《〈潮音〉跋》和《断鸿零雁记》的当”，后来经他和曼殊从弟苏维骥通信的结果，才解决了这一血统问题。这篇《苏曼殊传略》，曾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文艺茶话》一卷四期，后又收入开华版《全集》，可惜施蛰存同志都没有看到。关于这个问题，不仅柳亚子本人在五十年前已经纠正，最近柳无忌发自美国的一篇《关于苏曼殊》中又重加申论，肯定“苏曼殊是中国人”。他说，曼殊“亲生父母都是日本人”一说，是“我们误信曼殊自撰但故作玄虚的《〈潮音〉跋》，又根据他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内移花接木式的故事，做了这个错误的结论。”但不久以后，柳亚子“与曼殊在沥溪乡（香山县）苏家的亲戚直接通信，获得许多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关于曼殊身世的真相，始得大白。”（《人物》一九八一年第六期）不料到了一九八〇年，本书辑者还将那篇早为作者废弃的《新传》重印出来。还有一点，《新传》作者柳亚子名弃疾，故传末论赞一段以“柳弃疾曰”开始；本书在题目下和目录内都署柳亚子名，但论赞的第一句，却忽然变成了“柳无忌曰”！这也不知是何缘故。

这个辑本中的《曼殊新传》和《燕子龕遗诗序》都是从中央书店印本《苏曼殊诗文集》抄来，辑者说是他以前“所未尝见”的。又说“遗诗序即所以序王大觉（按即王德钟）辑本，而此本又亚子以仿宋大字刊行者，乃卷端无此文，是可异也。”（《跋二》）其实，《曼殊新传》原题《苏玄瑛新传》，与《燕子龕遗诗序》都先后两次收入北新版的《苏曼殊年谱及其他》和《全集》第四册“附录上”，流传已久。前一种收入《遗诗序》时，文后有柳亚子附记，说序成二年后，《遗诗》始付印，“适此文不知置何处，因未刊入。”这已说明了“卷端无此文”的原因。上述北新版的两种书和开华版《全集》，搜集曼殊著作和有关资料甚为丰富，为

研究者所必读；施蛰存同志在《引言》中自述青年时代是曼殊的“崇拜者”，现在又辑录曼殊的诗，而他竟未见及这些重要本子，反而求诸坊间俗本，这倒真是令人觉得“可异”的。

另外，本书在校勘断句上，也有一些错误。例如七律《何处》中“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妾意赊”一联，柳无忌辑《诗集》及柳亚子编两种《全集》所载，“妾意”均作“妄意”。郑桐荪致柳无忌函中所录亦为“妄意”（见《苏曼殊年谱及其他》附录），“妾”字因形近而讹。又如《寄晦闻》中“尚国诗人近若何？”句，“尚国”应为“南国”。卷首《曼殊新传》中记曼殊遗著，内有“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译》及《旅程图》”，分列四种，实为一书，即《佛国记》和《使西域记》的地名今译及旅程图，不应打那么多的书名号。又《新传》末评论中“或有玄璜生前所掩覆之迹，而暴露于身后”句，“或有”不通，据各本“有”皆作“谓”。在下卷诸家投赠诗中，有的题目较长，断句便往往发生错误。如柳亚子的《刘三以曼殊所绘黄叶楼图索题，年余未报，岁晏怀人，赋此奉寄》一题，竟误断为……“以曼殊所绘黄叶楼图，索题年余未报，……”。又如邓尔匹的《赤柱山下，值墨斋与一修髯客偕行，归语哲夫，知即余所访不迂之曼殊上人也，补赠一诗》一题，竟被误断为“……值墨斋与一修髯客，偕行归语，哲夫知即余所访不迂之曼殊上人也，……”。这本是几句浅近文言，不知何以竟错到如此地步。施蛰存同志在《引言》中曾说：也许他“这本书印出来之后，还会吸引许多爱好诗歌的青年。对于一些中年人，或者也可以供给他们补读以前未见之书。”从他所悬的这个鹄的来看，本书是还不能令人满意的。

### 刘斯奋《苏曼殊诗笺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较施辑本稍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斯奋的《苏曼殊诗笺注》。

本书收曼殊诗四十七题，共九十九首。另有译诗九首（原标十首，误）。它与施辑本不同之处，是没有《题画》和《题蔡哲夫藏担当山水册》二首，多出《和三姊妹韵》一首。《本事诗》十首，完全依据柳亚子编北新版和开华版两种《全集》，内容和顺序均无改动；只在这一组诗之后，节录文芷的《曼殊上人诗册》一文，作为附录，以见后来所传其中三首之不同。《诗册》中多出的“愧向尊前说报恩”一首，则作为“有待考证之作”，收入“附编”。并加按语说：“因此诗之真伪，牵涉到整组《本事诗》的重新审定，尚待查考，姑附于此。”我赞同对《本事诗》如此处理，不过“愧向尊前”一首，我仍认为应是曼殊佚诗，《本事诗》十首不是一次定稿组成，不会因这一首便发生“整组重新审定”的问题，理由已见上文评施辑本部分。关于题画二首，我也在上文谈过，这里都不再赘述。

《和三姊妹韵》一诗，文公直编《曼殊大师全集》自曼殊所遗残稿中录出，本书亦从之收入。所谓曼殊残稿，指萧纫秋藏、柳亚子编的《曼殊遗墨》（一九二九年六月北新书局影印）。这本《遗墨》，内容庞杂，有画稿，有杂记，有各种账单、遗物，间或抄录零星诗句，多未注明作者姓名。此诗前有长题：“因次光威哀韵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难俦（按本书误作传）虽谢家联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师来者？示予”以下为姊妹三人的联句。其后才是“次韵”二字，独立一行。现在生造了《和三姊妹韵》这个题目，将原题改为小序，又将“次韵”二字移到前面，紧接于“示予”之后，使它变成一首和诗的小序的样子。这些大概都是文公直胡改的（我手边无文氏此书，不知有无说明）。其实，

此诗并非曼殊所作，而是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作品，载《全唐诗》第十一函第十册“鱼玄机”卷（双峰书屋刻本），又见《唐女郎鱼玄机诗》（《四部备要》本，据黄丕烈藏宋本校刊）。在《全唐诗》中，这首诗的题目的末二句是“有客自京师来者示予，因次其韵”，不载三姊妹原作。曼殊在这本杂记中，共抄鱼玄机诗三首，先是“唐女郎鱼玄机诗”一行，接着抄录了《赠邻女》、《寄国香》二首，次页是三姊妹原作，第三页就是这首“次韵”和断句“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最后还有几句鱼玄机生平事略。也许因为“鱼玄机诗”一行和“次韵”诗不是抄在同一页上，当年文公直不察，闹了个笑话；今天本书又沿袭了这个错误，实在令人遗憾。不仅如此，本书还将此诗编入一九一六年，笺语中说：“《遗墨》刊行时曾注明为‘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纪’。姑附于此。”将一千年前唐代人的诗认为是曼殊一九一六年之作，这真是出人意料的事。（附带说一句：查我所见的《曼殊遗墨》初版本，此诗前后都无此语，甚至在全书中也遍寻不获，真是奇怪！）

本书特点之一是编年。曼殊诗生前没有定本，编年是很困难的。王德钟在《燕子龛遗诗序》中早就说过：“其作诗年月，莫获详其先后，颇憾排比失序。”后来柳亚子作《曼殊诗年月考》，也说“曼殊作诗的年月，是很难证实的”。他主要依据在报刊上发表的时间，加以考证。本书就是以柳著《年月考》为基础按年编排的。但《年月考》只限于北新版《曼殊全集》中已有的诗，后来开华版《全集》增补的九题十一首，柳亚子没有作过考证，因此，本书除《花朝》编入一九〇七年、《步韵答云上人》（三首）编入一九一〇年外，其余七首均作为“不编年诗”处理。对于编年部分，我想谈几点意见：《答邓绳侯》一首，笺云：“此诗作于一九〇六年。”系据曼殊丙午年（一九〇六）所作《画跋》考定。按此诗最早收入北新版《曼殊全集》诗集补遗，据编者记，“系凌挹秀君寄来，应是一九〇六年的作品。”可与《画跋》参证。《忆刘三·天梅》一首，笺云：“此诗出处未详，文公直编《曼殊大师全集》断为一九〇七年作。”按此诗亦见北新版《全集》诗集补遗，据编者记，系“从刘季平君处所藏曼殊墨迹手札内发现，应是一九〇七年的作品。”刘季平即刘三，出处及作年均已说明。文公直显然是从此抄来。又《花朝》一首，笺云：“此诗出处未详。文公直编《曼殊大师全集》断为一九〇七年作，姑从之。”按此诗最早载开华版《曼殊全集》，笺注者没有转述文公直断为一九〇七年作的依据，因此我们也不知“姑从之”的理由。对于不编年部分，我也有一点补充，即其中《以胭脂为某君题扇》和《碧阑》二首，曾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当代诗文》创刊号。这杂志由当代诗文社刊行、世界书局总经售，创刊号中有柳亚子、刘大白等人的诗文，曼殊诗应即柳亚子送去刊出的。这是此二首最早发表的时间和处所，但由于发表时间是在曼殊逝世十年以后，不能据以推断作诗的年月。这不编年的七首，在本书中的排列先后，完全打乱了开华版《全集》的次序；即不编年，不知何以要如此改动？这样做，只不过徒滋纷乱，使读者堕入迷茫不解之中。

曼殊诗过去没有笺注本。本书笺语说明作诗的年月、出处及提供有关的本事材料，相当详尽，注释也简明妥贴。例如，《久欲南归罗浮不果……》一首，笺语据曼殊与黄晦闻、蔡哲夫相识的时间及曼殊致刘三信，考定此诗作于一九〇八年冬末或次年初春。黄晦闻和邓秋枚等人清末创办《国粹学报》及国学保存会，在学术思想战线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桴鼓相应；笺语较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简历及其曼殊的关系，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曼殊早年的为人。《过平户延平诞生处》一首，笺语点明郑成功的母亲翁氏为日本人，与曼殊

相同，并引陈去病赠曼殊诗“正朔天南奉盛明，孤忠唯有郑延平”句，以衬映曼殊此诗所包含的思想感情。《题〈拜伦集〉》一首，因小序中述及“西班牙雪鸿女诗人”赠《拜伦遗集》事，注释便从曼殊《与高天梅论文学书》、《〈潮音〉跋》、《断鸿零雁记》及《答玛德利壮湘处士书》等文字中，集中了有关雪鸿的资料，以说明她和曼殊的交谊。又如《无题》八首，笺语据郑桐荪“曼师有无题诗百绝之作”语，认为这八首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对读者都是很有帮助的。各诗笺语中，关于写作年月，大抵都是袭用柳亚子《曼殊诗年月考》原文，但也偶有改正的地方。如《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三》一首，柳认为“应是一九〇九年下半年在杭州的作品”，本书据曼殊《画跋》和柳亚子后来所作《重订苏曼殊年表》，改定为一九〇八年秋所作。又如《浣江道中口占》一首，柳《考》有曼殊一九一〇年“上半年在爪哇，下半年在印度”等语，本书据《重订年表》，改为“曼殊此年全年均在爪哇噠班。”这两点可见笺注的细致。自然，本书笺注方面也还有不足之处，如全书第一首《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的笺语，根据旧有材料，说汤国顿是曼殊在苏州吴中公学任教时的同事，但最近柳无忌在《关于苏曼殊》一文中说，汤国顿是曼殊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读书时的老师，一九〇三年曼殊归国时，汤去送行，曼殊就以诗和画留赠他。《忆刘三·天梅》小序中“慈亲”的注释说：“曼殊的生母若子，为一日本下女。”这是据以前柳亚子的说法。最近数年，则有若子，为曼殊庶母日本人河合仙的远房侄女或河合氏之妹的两种新说。后一说是曼殊幼妹苏惠珊一九六九年香港提出的，柳无忌以为“最为近情合理”，他“愿意放弃父亲以若子为下女的说法”。（见柳无忌一九七七年作《我不认识的苏曼殊》）这都是后出的资料，可供将来再版时补订。还有诗中的一些字和词，本来好懂，无须作注，最好能略加删汰，以免烦絮。至于译诗的注释，也比较详尽；本文旨在讨论曼殊自作诗部分，这里就不多说了。

本书“附编”中断句“我本将心比（按应作向）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一联，原出《燕子龕随笔》，是曼殊倩人刻在一方石印上的，并未说明是自作或他人成句。柳亚子据黄晦闻在边款中的“曼殊和尚近句”一语，相信是曼殊自己的断句。但他在编辑北新版《苏曼殊全集》时，却又将此联和其他断句“一起删除，以清纠葛”。（《苏和尚杂谈·曼殊遗诗辨伪》）可见他对这一联还是持保留态度的。按曼殊当年将此联和他自己的“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一联，倩人刻成一对印章，黄晦闻所谓“曼殊和尚近句”，是指“袈裟”一联。至于这两句诗确实不是曼殊的佚句，我曾经在明清人的笔记或诗话中见过，可惜没有抄录下来，目前一时又查不出；暂记于此，以俟今后注意查寻。

最后，应当一提刘斯奋同志为本书写的《前言》。这篇《前言》扼要介绍了苏曼殊的生平及其作品，肯定曼殊是清末民初一位有特色的诗人、一位爱国的作家。从曼殊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他思想中强烈的个性主义，认为他的种种耸动世俗的“奇行”，是他反抗社会传统势力的一种方式；特别着重论述了曼殊的诗歌创作所受于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这些诗作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和独特风格；同时，也明确指出曼殊思想行为的颓唐落后的一面，对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也说具有体裁单一，题材狭隘，所反映的社会面不够广泛等缺点。这是一篇比较公允的文章，可供曼殊著作的读者参考。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